

异本对勘的典范之作

——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为例

□ 郑 玲

摘要:传世的《弥勒会见记》有回鹘语、吐火罗语、于阗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将《弥勒会见记》置于大语文的视阈中,以耿世民解读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为底本,对勘季羨林释读的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严格遵循国际语文学和异本对勘的研究惯例,比较甄别、梳理分析,摘取其在不同学科中的闪光点深入研究,多侧面剖析其多学科的价值及意义,涉及语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翻译学、文学史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既有对文本的基本释读,又有多层面的深层探析。

关键词:《弥勒会见记》;异本对勘

作者简介:郑玲(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项目编号14CYY039)的阶段性成果。

一、《弥勒会见记》的发现

据佛教典籍记载,原本出身婆罗门的弥勒是重要的菩萨之一,之后成为佛弟子,自佛授记(预言)将继续释迦牟尼位为未来佛(“当佛”)。《弥勒会见记》(简称《弥》)首先是一部佛教典籍,主要讲述弥勒出家得道、授记成佛、普渡众生的故事,但与传统佛教典籍不同的是,它以文学剧本的表现形式得以呈现,1个序幕和27个正幕是其主要表现内容。^[1]置于篇首的序幕部分包含了佛教说教的内容和布施者功德回向的愿望,正幕部分则围绕弥勒的生平事迹展开。从佛教教派性质的归属上看,《弥勒会见记》不单纯的是一部小乘佛教作品,其中夹杂有大乘佛教的部分观点,作品已呈现出大乘佛教的影响。就目前出土情况来看,传世的《弥勒会见记》有回鹘语、吐火罗语、于阗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其中的回鹘文本因其发现地的不同,被学界分别命名为哈密本、德国胜金口本和德国木头沟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弥》被分别保存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德国科学院等机构中。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作为佛经翻译典范之一的《弥勒会见记》,于20个世纪分别出土于我国新疆哈密、吐鲁番等地,其中回鹘文本的发现要早于吐火罗文本。1959年,在天山以北的哈密地区的脱米尔底佛教遗址中,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

由一名牧羊人首先发现,后经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的初步鉴定为《弥》的残卷。其装帧方式为梵文式,装帧材质为褐黄色硬纸,全文在书写字体的颜色上略有差别,每页由浅黑色边线画出,全文由黑色字体书写,而每幕则用红色字体标明演出地点。该部文献属于不可多得的大部头文献,共约293叶(586页)之多,其中保存完整无损或大体完好的为114叶,约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之后该文本被保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为了与德国本作出区别,学界通常称其为哈密本。

二、《弥勒会见记》不同文本之渊源递嬗关系

在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跋文中存有多处关于该文献文本来源的相关记载,原文如是记录: alqu šastar nomlaraý adartlayu uqtačĩ waybaš šastarlaý noš suwsuš ičmiš aryčantri bodiswt kši ačari ānātkāk tilintin toxri tilinčā yaratmīš prtnarakšit kranwaziki türk tilinčā āwirmiš maitrisimit (nom bitig)dā badari bramannīng yaýışya amaq(atlay baštīnqī) ülüš tükādi(.). 耿世民先生将上述文字作出了汉文译文:“精通一切经论的像甘露一样痛饮毗婆沙诸论的圣月大师从印度语制成吐火罗语,智护戒师又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中的‘跋多利婆罗门行施舍’。第一章完。”^{[2]89-90} 诸如上述的文字在该文献中出现多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可为我们深入探讨《弥勒会见记》文本来源、文本性质等重要问题提供提示和参考。

首先,本段文字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关键词语“印度语”、“吐火罗语”和“突厥语”,由此可以断定《弥勒会见记》的原始记录语言应为古印度语,吐火罗语和突厥语(回鹘语)是二度翻译所用的语言。

其次,《弥勒会见记》三个不同语言版本之间存在母本与子本的渊源关系,而上述译本应离不开两位翻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一位是精通佛理的圣月菩萨大师,一位是娴熟运用吐火罗语和回鹘语的语言大师智护戒师。

最后,有关《弥勒会见记》文本性质的归属问题,“制成”一词表明该文献自古印度文本开始,便历经圣月、智护两位语言大师的改编和再创作。文本中多次出现表明戏剧因素的专有名词,如场次、场景变化、出场人物、演出曲调等,彰显了《弥勒会见记》文学剧本的属性。

三、全新视角下的《弥勒会见记》之异本对勘

立足于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弥勒会见记》置于大语文的视阈下,以耿世民解读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为底本,对勘季羨林释读的吐火罗文本《弥》,严格遵循国际语文学研究惯例,依次列出吐火罗文转写、英文译文、汉文译文和与之对应的回鹘文转写、汉文译文以及注释、考证等,比较甄别、梳理分析,摘取其在不同学科中的闪光点深入研究,多侧面剖析其多学科的价值及意义,涉及语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翻译学、文学史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既有对文本的基本释读,又有多层面的深层探析。

首先,从研究视角上看,摒弃语文学囿于文献释读和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将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置于大语文视阈下,从语言接触与文化互动、文献与宗教文化交流融合、回鹘佛经翻译技巧与理念等维度综合考察其学术价值,拓展对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新思路。

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将文本校勘的基础性研究与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相结合,对佛教外来词的构成演变规则、回鹘语基本词汇中kim一词句法功能的历史演变、翻译原则的沿袭与创新、借词的使用及多种宗教的影响、中国戏剧史形成新说等问题,均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看,综合运用文献调查、个案研究和交叉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最具代表性的前两幕内容为个案,广泛搜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不

同文本及版本的《弥勒会见记》展开对勘甄别、梳理分析,选取佛教词语的回鹘语化、吐火罗语对梵语的过滤、翻译技巧的承袭及创新、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其理论价值及意义,既有不同文本的比较对勘和再释读,又包含多学科的深层探析。

最后,从基本观点上看,吐火罗语在梵语和回鹘语中所起的桥梁和媒介作用,提供更早的语言学例证;高昌回鹘时期佛教、摩尼教、原始宗教的交流融合,为中国多元通和的基本宗教格局提供历史佐证;借用与活用汉译佛经翻译原则与技巧是少数民族佛经翻译得以丰富的基本途径;《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西域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及贡献突破了戏剧成熟于元杂剧的传统观点。

(一)同源异本之《弥勒会见记》

同源异本的《弥勒会见记》研究属于文献学范畴内的对勘研究,对勘所用原始材料分别为吐火罗文焉耆语本的《弥勒会见记》^[3]和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其中吐本已被季羨林先生全文释读并已结集出版,而回鹘文本则由耿世民先生解读并作出了系列研究。

原始文献中的第一幕为“跋多利婆罗门举行布施”,该幕内容始自一段天神之间的生动对话,三位飘逸云间的天神相互寒暄和说神道法,为大家讲述佛祖释迦摩尼已成正等觉得佛果,此刻在孤绝山上布道说法,芸芸众生出家求佛,接下来作为跋多利婆罗门的得意门生的弥勒将拜别恩师出家为僧。在得知佛祖已得佛果后,他希冀能亲见佛祖讲经说法,但因自身年事已高不能目睹佛祖、聆听说法而深感遗憾,于是便派出自己的16位弟子前去孤绝山。第二幕“弥勒菩萨出家成道”主要围绕弥勒出家得道展开,详细讲述跋多利婆罗门的16位弟子拜别恩师出家为僧的故事。

针对上述两幕内容,按照吐火罗文本的编号顺序进行划分,将吐火罗文和回鹘文两文本中内容对等或相似部分展开对勘,对勘格式采用吐火罗文转写、吐火罗文英文译文(这两部分内容已由季羨林先生译出)、吐火罗文汉文译文(作者本人翻译)和回鹘文转写、汉文译文(这两部分内容已由耿世民先生译出)并举,每行对勘之后增加作者案语,主要关注吐本和回本中文字的增删有无、措辞差异、词语借用、语音演变、翻译技巧等诸多方面。对勘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弥》,可以帮助认清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文本性质,并为后文展开语言学、宗教学、翻译学和文学史等相关领域的探讨奠定翔实的资料基础。

(二)接触与互动——《弥勒会见记》外来词的生成与演变

存世的西域出土文献多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书写而成,这些双语或多语文献为我们了解古代西域的语言接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我们观察和研究语言变异、语言底层及其原因等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线索。因与吐火罗文本存在母本与译本的渊源关系,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颇具语言学研究价值,在不同质素语言传译过程中,语言接触势必带来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变化。以语言接触理论为切入点,以回鹘文佛教词汇为例,进而分析吐火罗语对回鹘语的影响。

首先,语音方面,吐火罗语对回鹘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尾音节呈现出的有规律的演变和元音弱化等现象,通过筛选《弥勒会见记》中的佛教借词,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演变规律:1.在元音方面,回鹘语中无长元音 $\bar{a}$ / $\bar{A}$ 、 $\bar{i}$ 、 $\bar{u}$,在译为回鹘语时以 a 、 i 、 u 替代之;2.词尾元音弱化(高化)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形成了由梵语 $-a$ 至吐火罗语 $-e$ 最终高化为回鹘语的 $-i$ 的演变轨迹;3.词尾元音 $-a$ 的脱落,当梵语以元音 $-a$ 结尾时,吐火罗语一般情况下以零形式与之对应,回鹘语也很有规律地采用了这种借词形式。

其次,词汇方面,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借词“本族化”现象,不仅是语言开放性和封闭性的交集体现,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不同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渗透和融合过程。在《弥勒会见记》中出现了数量丰富的“合璧外来词”,其构成方式通常为音译词缀接表示类属范畴的回鹘语词,这种特殊的借用方式,说明了外来词汇与回鹘语的“密切合作”关系,而不同语言的接触也可以为我们厘清

部分词语的历史演变提供参考的依据。

最后,语法方面,以《弥》中的一个语言实例——kim来诠释吐火罗语对回鹘语的影响。在历代重要文献及至现代维吾尔语中,kim首先保持了疑问代词“谁”的基本用法。自《弥勒会见记》开始,新增了作为句与句之间连接词的句法功能,这一新的功能基本延续至晚清时期。而在现代突厥语族语言中,kim的用法又再次回归到疑问代词“谁”上来。kim新增语法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一种欧化语法现象的体现。在所能接触到的阿尔泰语系的亲属语言满通古斯语中,现代蒙古语中同样也存在一个表示“谁”之义的疑问代词“kin”,在句法功能中同样具有连接词的作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一种推断:至少说明kim一词的新增句法功能在蒙古语中得到了延续,而这种语法的接触是深层次的,具有历史延续性。

(三)流布与融合——《弥勒会见记》之宗教文化价值

回鹘自漠北迁至高昌后,随地应化皈依大乘佛教,而没有信奉周围地区广为流传的小乘佛教,这一点充分说明了高昌回鹘的佛教信仰是与当地固有的佛教信仰一脉相承,高昌回鹘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是在当地原来佛教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和发展。“这个佛教文化,深受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两者在信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其相近,可以说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是汉族和回鹘两个兄弟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盛开的友谊之花,是研究汉和回鹘两个兄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之一。”^[4]杨富学在《回鹘弥勒信仰》一文中也认可高昌回鹘佛教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可被视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是汉传佛教强烈影响我国周边民族的一个典型范例”^[5]。

汤用彤曾对早期弥勒经典的传译作出如此评价:“而传译经典于中国者,初为安息、康居、于阗。”^{[6]33}其实早于大量成规模的佛典翻译开始之前,在西域和河西走廊等地就曾以石窟的开凿和图像塑造的方式传播着弥勒上生兜率天宫讲经说法的思想,以石窟造像或佛典传译等形式的佛教弥勒信仰的传播,其传播路径大致可勾勒为由古印度经由西域至河西走廊再至中原内地。

在谈及弥勒信仰在佛教东传中的作用时,季羨林先生曾提出这样的一个论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众多不同文字写成的《印度佛教史》或《中国佛教史》一类的书籍,我几乎都读过或翻过,但是迄今我还没有在任何一部这样的书中发现强调弥勒佛在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叙述。”^[7]这段话指出了在佛教史的研究范畴中,大家几乎忽略了弥勒及弥勒信仰在助推佛教东传中原内地的价值和贡献所在。无论从《法显传》、《大唐西域记》还是《大正藏经》、《法苑珠林》、《释迦方志》中我们都应该从多个角度考察弥勒信仰的价值并且肯定其在传播学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古印度佛教中的弥勒信仰约于公元一世纪兴起,后传入西域,在西域广泛流行,呈现一番盛行之貌。以西域佛教石窟壁画、西域佛教出土文献以及西域佛教经典翻译等视角阐述弥勒信仰在西域的传播盛况,为弥勒信仰在西域佛教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弥勒信仰曾在西域广泛传播的观点已然为多数学者认同。用多种文字记载的《弥勒会见记》在西域的出现绝非偶然,至少说明时至唐代后期,哈密地区已经成为高昌回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辐射点和传播中心。

(四)继承与吐纳——《弥勒会见记》翻译风格探析

西域历史上曾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融合的古代文明传播区域之一,在东渐西传的文化交流中,翻译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一部西域翻译史是历代翻译家和无数不见史册的译者的心血结晶,更是一部多民族的交流史,频繁的语言接触和繁荣的翻译活动使得西域成为翻译研究的资料宝库。

在回顾西域翻译历史和梳理汉译佛经理念的基础上,对勘吐本和回鹘本《弥勒会见记》,可以

发现回鹘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一方面传承汉文翻译中如“五失本”、“三不易”等基本理念,一方面使用增加话题转移标记如 anta ötr ü 等、使用呼语、增加修饰类、数量词类、佛的尊号、名词性等修饰语的翻译手法,再现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使得回鹘文本在上下语境的连接贯通、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更具口语化,其佛教文学作品或者作为早期的文学剧本性质更为突出。

在由古印度语至吐火罗语再至回鹘语的传译过程中,《弥勒会见记》的不同译本所述母题基本保持一致,但二次翻译不可避免地留有异质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印记。《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不仅是相关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复杂内容,其传译价值应是多方面的。对勘不同译本的《弥勒会见记》为我们全面了解和蠡测佛教在西域的流布,不同语系间的语言接触提供了可能性。

(五)反思与重构——《弥勒会见记》之文学史价值

《弥勒会见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更是一部价值颇丰的文学作品,作为异质文化传播的典范之作,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为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首先,作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的西域地区最早吸收并传播了外来的戏剧文化。这一过程,相比中原内地,西域进行的时间最早,吸收外来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交流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次,尽管目前尚无确凿资料可以证明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曾在古代西域诸地作为戏剧的形式演出过,但是作为古代维吾尔民族的文学剧本,其产生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南宋时期的戏文剧本,这必将改变学界长期以来的我国戏剧源于元杂剧的传统见解,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弥勒会见记》这一文献的必要性所在。

西域佛教戏剧传入中原,促进了中原固有戏剧的发展,从而助推中国戏剧逐步走向成熟。《弥勒会见记》从吐火罗焉耆文本到回鹘文本之间的传译可窥见西域戏剧的演变轨迹,源于古印度的戏剧在西域地区经历了再次创作的过程,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戏剧因素逐步削弱,有向变文过渡的迹象,在古印度戏剧、西域戏剧和中国戏剧这三个概念之间,西域戏剧扮演了印度戏剧对中国戏剧文学发生影响的一个津梁的角色。

历史遗存的形象性和珍贵性决定了《弥勒会见记》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弥勒会见记》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原戏剧的形成,其里程碑的意义不言而喻。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西域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及贡献突破了戏剧成熟于元杂剧的传统观点。因此值得我们今天反思该剧本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价值,重构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弥勒会见记》的发现肯定了印度戏剧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可能性。在其由西向东传译过程中,戏剧艺术已臻成熟,在促进西域戏剧繁荣、对中国戏剧史的贡献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四、《弥勒会见记》之多学科研究意义

文本史料学意义。选取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前两品,与德国所藏木头沟本和胜金口本两个版本相对比,按照国际语文学研究惯例,对其进行原文换写、原文转写、汉译、注释和考证。同题异本研究,是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础,可以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文本,涉及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语言演变规则并由此引发的语言转换带来的翻译理念和技巧的运用,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文学归属问题的讨论及其该文献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贡献等问题,提供翔实有力的文献依据。

语言学意义。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的符号,更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与其他民族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这种交流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不同语言相互

之间存在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的影响和接纳,并在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得以不断的演变发展。目前存世的《弥勒会见记》的几大版本有一个共同的原始文本出处,均译自吐火罗文本,在不同质素语言传译过程中,语言接触势必带来词汇等方面的变化,与季羨林释读的吐火罗文本相对勘,不难发现吐火罗语在语音形式尤其是在回鹘语词语的词尾形式的影响较为明显,且有规律可循;以回鹘语中的佛教词汇为例,分析外来词的来源及其类别,特别是合璧外来词这一借词方式,进而分析吐火罗语对回鹘语词汇层面的深度影响,并选取具有明显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功能演变的个例“kim”一词展开谈论,进一步为吐火罗语和回鹘语两大语言接触的历史史实提供可资借鉴的语言依据,这不仅对回鹘语文研究,而且对突厥语言史、维吾尔语言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学意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自吐火罗文,分别经由圣月大师和智护大师之手编译。在二度翻译过程中,佛教翻译中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理念及高超娴熟的翻译技巧,如呼语的使用、修饰语的增加等可以丰富我国少数民族佛经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对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展开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赋予丝路文化新的发展契机,对保留至今的民族典籍的再研究,既为深入了解民族地区典籍翻译提供充分的前期基础,又具有描绘更为完整的中国古籍传承与传播画卷的重大文化意义,为我国文化典籍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新鲜的血液和新的研究点,从而丰富典籍翻译研究,发展祖国的翻译事业。

宗教文化意义。《弥勒会见记》是古丝绸之路高昌回鹘时期盛行的小乘佛教剧本,以它为研究对象,可以厘清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流变过程、回鹘佛教的特征、弥勒信仰东渐以及《弥勒会见记》在东渐中的历史贡献等诸多问题,从而为比较宗教学提供一份翔实可信的文献资料。

文学史研究意义。以哈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佛教翻译文学对西域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在文学语言、行文体制、文学体裁及文学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反观该文献之文学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值得反思与重构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郑玲.反思与重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刍议[J].宁夏社会科学,2016(6).
- [2]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 [3]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M]//季羨林文集:第11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4]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J].新疆社会科学,1982(1).
- [5]杨富学.回鹘弥勒信仰考[J].佛学研究,2018(1).
-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7]季羨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J].文史哲,2001(1).

(责任编辑 孙颖慧)